

《2019 年國際海洋事務論壇》，金門大學，2019.11.22

歐盟共同漁業政策—兼論對台的黃牌警告

鍾志明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歐洲聯盟的共同漁業政策，原屬共同農業政策的一部分。1970 年代開始制定漁業相關規則，如可捕量與配額、限縮過度的漁撈能力以及建立漁產共同市場組織等，以保護歐盟水域之漁業資源和漁業產品之供需穩定。直到 1983 年才訂定漁業資源養護政策和漁業經營制度，以追求藍色歐洲的理念。而隨著科技進步、會員國數量增加、消費者習慣改變與自然環境之影響，歐盟數度針對共同漁業政策進行重大改革，除檢討執行缺失，也提出改革方向與具體改善措施，維持歐盟水域漁業資源之穩定，促進漁業社區經濟與產業發展。

最近的一次共同漁業政策改革是在 2014 年，新的法律規範旨在維持魚類種群、促進具競爭力的漁業經濟發展和穩定漁產品市場，意味著歐盟漁業政策的根本變化，尤其是永續經營已成為漁業中最重要的原則，並採取了嚴格的措施來重建魚類種群和現代漁業管理。最遲在 2020 年之前，應按照最大持續生產量原則管理所有商業捕撈的魚類種群，除可確保魚群的永續生產與利用，也構成經濟上可行的漁業基礎。

本文將就歐洲聯盟制定共同漁業政策之起源、2014 年共同漁業政策改革內容、及其對內與對外政策等面向進行剖析，同時對於台灣被歐盟列入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業的不合作第三國警告名單，經數年努力方擺脫黃牌汙名和可能的制裁，本文也建議我漁政單位應投入充足資源和人力以落實執法，並對我漁業轉型更堅定地採取必要之改革措施。

關鍵字：歐洲聯盟；共同漁業政策；最大持續生產量；黃牌警告

一、前言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的共同漁業政策，原屬前身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簡稱歐體或共同體）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的一部分。1970 年代歐體開始制定漁業相關規則，如可捕量與配額、限縮過度的漁撈能力以及建立漁產共同市場組織等，以保護共同體水域之漁業資源和漁業產品之供需穩定。直到 1983 年才訂定漁業資源養護政策和漁業經營制度，以追求「藍色歐洲」（Blue Europe）的理念。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會員國數量增加、消費者習慣改變與自然環境之影響，歐體或歐盟數度針對共同漁業政策進行重大改革，除檢討執行缺失，也提出改革方向與具體改善措施，維持歐盟水域漁業資源之穩定，促進漁業社區經濟與產業發展。

最近的一次共同漁業政策改革是在 2014 年，新的法律規範旨在維持魚類種群、促進具競爭力的漁業經濟發展和穩定漁產品市場，意味著歐盟漁業政策的根本變化，尤其是永續經營已成為漁業中最重要的原則，並採取了嚴格的措施來重建魚類種群和現代漁業管理。最遲在 2020 年之前，應按照最大持續生產量原則管理所有商業捕撈的魚類種群，除可確保魚群的永續生產與利用，也構成經濟上可行的漁業基礎。

本文將就歐洲共同體制定共同漁業政策之起源、政策之制定和發展、2014 年共同漁業政策改革內容、及其對內與對外政策等面向進行剖析，同時對於台灣被歐洲聯盟列入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業的不合作第三國警告名單，經數年努力方擺脫黃牌汙名和可能的制裁，本文也建議我漁政單位應投入充足資源和人力以落實執法，並對我漁業轉型更堅定地採取必要之改革措施。

二、共同漁業政策之起源與發展

有關歐洲共同體漁業方面的單獨規範，是直到在 1983 年才從農業政策獨立出來，成為共同漁業政策，雖奠基在與共同農業政策相同的法律基礎上（羅馬條約第 38 至 47 條，今歐盟運作條約第 38 至 44 條），但仍顯示出其重要性日增。由於捕撈技術與造船工藝的進步，使得漁業活動更加蓬勃發展，卻也導致過度捕撈和各國間的漁業糾紛。因此，推動共同漁業政策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追求更高的經濟收益，更重要的是要制訂完善的養護政策、管制漁獲量、調整產業結構、

控制市場、協調對外貿易並解決漁業社區之發展問題。¹由於國際環境的變遷以及個別會員國的因素，共同漁業政策歷經數個階段的發展。²

(一) 歐體漁業政策之萌芽

共同農業政策原本就有包含漁業面向，1958 年生效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第 38 條第 1 項明白規定：「共同市場應擴及農業和農產品貿易，農產品係指土壤作物、畜牧、漁業以及經與此類產品直接有關之初步加工階段後之產品」。此外，第 39 條臚列了共同農業（包含漁業）政策之目標，分別為提高生產力、確保農業區之生活水準、穩定市場、正常供給以及提供消費者合理價格等。相關政策法規由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簡稱執委會）提案，部長理事會（Council of Ministers，簡稱理事會）在諮詢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意見後，以條件多數做成決議。

進入 1960 年代之後，會員國面臨調和漁業養護措施、穩定就業市場、以及均衡發展漁業經濟等問題，亟須配套方案措施，協助整合各國漁業管理，朝向共同市場前進。³惟當時是由個別國家在共同體架構外的組織提出討論，如「東北大西洋漁業委員會」（North East Atlantic Fisheries Commission, NEAFC）依據科學家的評估，建議會員國共同規範漁撈網尺寸、各類魚種可捕大小、以及保存漁業資源。⁴正因該委員會不具執行權限，所以又回到歐體架構內尋求解決解決。經執委會提案以及諮詢歐洲議會意見之後，部長理事會在 1970 年 10 月通過兩項規則，分別規範共同漁業政策的初步架構、作業漁區捕撈準則、建立共同市場組織以及與第三國的貿易。⁵其中，第 2141/70 號規則第 5 條更是嚴加限制在會員國漁捕區的可捕範圍、季節和使用之漁具。

不過，就在六國通過上述兩項法規後，歐體第一次擴大的談判也剛好展開。按理新加入的會員國應全盤接受歐體的條約和之前所通過的法律規範（*acquis communautaire*），但是英國和挪威極力反對第 2141/70 號規則有關平等入漁（*equal access*）原則，而希望保留近海與沿海漁權給當地漁民。經過談判，各國同意 6 海浬之內僅開放給傳統上在此捕魚之本國漁民，平等入漁原則僅適用在 6 海浬之外；理事會應在 1976 年年底前訂定保護魚群和海洋資源的條款，並依據執委會於 1982

¹ John McCormick, *Th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and Policies*, 3r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4), p. 296.

² Carsten L. Jense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Common Fisheries Policy* (Esbjerg: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Business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1999), pp.15-31.

³ 張平怡，《歐洲共同體共同漁業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頁 26-30。

⁴ Jensen, *op. cit.*, p. 16.

⁵ “Regulation (EEC) No 2141/70 of the Council of 20 October 1970 laying down a common structural policy for the fishing industry”, *Official Journal (OJ)* L 236/1-4, 27.10.1970; “Regulation (EEC) No 2142/70 of the Council of 20 October 1970 on the common organisation of the market in fishery products”, *OJ* L 236/5-20, 27.10.1970.

年底前所提會員國沿海地區經濟暨社會發展的報告為基礎，制定歐洲共同體的共同漁業政策。⁶

(二) 導入 200 海哩專屬經濟區之漁業政策

因應聯合國所召開的第三次海洋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擬將國家的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s)海域延伸至 200 海哩，歐體部長理事會於 1976 年 10 月在荷蘭海牙做成決議：⁷

1. 自 1977 年 1 月 1 日起，歐體專屬經濟海域正式擴大到 200 海哩範圍；
2. 訂定特別魚種之可捕量和漁撈規則，管理歐體海域內的漁業資源，分配各會員國之可捕配額；
3. 授權執委會對外進行漁業談判，以確保會員國在第三國海域作業權益；
4. 保留會員國 12 海哩近海傳統漁區，並得禁止他國在此進行漁撈作業。

不過，對於漁業養護措施方面，理事會決議缺乏具體明確的規範，僅要求會員國不可採取任何片面之養護措施，而在「東北大西洋漁業委員會」以及「西北大西洋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North West Atlantic Fisheries)等區域性或國際性組織中，所有會員國必須採取一致的立場。直到 1978 年部長們才達成共識，同意針對漁撈設備和網眼尺寸進行限制，同時設立禁漁期、禁捕海域以及禁捕魚種，以達養護漁業資源的目標。⁸

專屬經濟區擴大至 200 海哩對共同漁業政策發展的影響是，歐體執委會獲得授權，可以與第三國進行漁業相關協定之談判，俾取得進入對方專屬經濟區進行漁撈的互惠待遇；而執委會也可利用手中共同商業政策的談判籌碼，例如給予進入歐體市場的貿易優惠，來換取第三國漁捕區的漁業資源。⁹此發展對共同體的整合帶來正面影響，說明團結力量大，各會員國將漁業政策主導權逐步交給歐體超國家機關來管理，也使得共同漁業政策的雛形越來越清晰。

(三) 建立共同漁業政策

當共同體正在談判向南擴大、準備接納南歐漁業大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際，部長理事會於 1982/1983 年通過三類法案—分別是養護政策(Conservation Policy)

⁶ 參見林語崇，《歐洲聯盟共同漁業政策之發展與變革》(嘉義：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19-20。

⁷ 同上註，頁 20-22。

⁸ 同上註，頁 23-24。

⁹ Jensen, *op. cit.*, p. 19.

10、結構政策（Structural Policy）¹¹與管制政策（Control Policy）¹²—較全面性地構建共同漁業政策，確立將養護漁業資源作為根本目標，訂定總可捕量和會員國配額制度，並尊重各國沿岸水域的歷史性漁權，對漁業進行補貼，以及促進漁捕現代化等¹³，朝向漁業永續經營而努力。

漁業政策實施 10 年之後，為順應最新的發展，1992 年歐盟把水產養殖也納入了此項政策的範圍，並解決漁船數量和可捕量之間嚴重失衡的問題。¹⁴接著又在十年過後，再度對共同漁業政策進行調整與改革，理事會於 2002 年通過三項法規，分別是第 2369/2002 號規則計畫以輔導漁業財政援助辦法（Financial Instrument of Fisheries Guidance）重整歐盟漁業部門¹⁵，建立減船措施的第 2370/2002 號規則¹⁶，以及第 2371/2002 號有關漁業資源保護與開發規則¹⁷。就內容來說，包含以下幾個主要層面：¹⁸

1. 建立長期漁業管理機制，並納入海洋生態與資源的保護；
2. 設立區域諮詢委員會（Regional Advisory Councils），提高漁民和其他利害關係人對共同漁業政策之參與；
3. 加強會員國漁業部門在檢查和執法上的合作，執委會負責總體監控；
4. 實施新的漁船政策，鼓勵減船和贖買漁業權。

三、共同漁業政策最新改革內容

¹⁰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170/83 of 25 January 1983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system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ishery resources”, *OJ L* 24/1-13, 27.1.1983;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171/83 of 25 January 1983 laying down certain technical measur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OJ L* 24/14-29, 27.1.1983.

¹¹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908/83 of 4 October 1983 on a common measure for restructuring, modernizing and developing the fishing industry and for developing aquaculture”, *OJ L* 290/1-8, 22.10.1983.

¹²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57/82 of 29 June 1982 establishing certain control measures for fishing activities by vessels of the Member States”, *OJ L* 220/1-5, 29.7.1982.

¹³ 鄒忠科，〈歐盟共同漁業政策研究：兼論其對台灣漁業政策之啟示〉，《歐洲國際評論》，第 8 期，2012，頁 8。

¹⁴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3760/92 of 20 December 1992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system for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OJ L* 389/1-14, 31.12.1992.

¹⁵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369/2002 of 20 December 2002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2792/1999 laying down the detailed rules and arrangements regarding Community structural assistance in the fisheries sector”, *OJ L* 358/49-56, 31.12.2002.

¹⁶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370/2002 of 20 December 2002 establishing an emergency Community measure for scrapping fishing vessels”, *OJ L* 358/57-58, 31.12.2002.

¹⁷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371/2002 of 20 December 2002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fisheries resources under the Common Fisheries Policy”, *OJ L* 358/59-80, 31.12.2002.

¹⁸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Common Fisheries Policy - A User's Guide*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9), pp. 8-11.

然而，執委會與專家的檢討評估指出，歐盟國家漁捕總量越來越少，漁業部門的就業人數持續降低，實施共同漁業政策的結果，並未使歐盟漁業走向永續發展之路。究其原因即為漁業資源的過度捕撈，漁民面對無魚可抓的窘境。為使漁業資源存量能維持在永續水準，2011年下半年，執委會提議對共同漁業政策進行新一輪的改革。改革的重點在於漁業的永續經營，尤其著重在最大可捕量、多年期生態漁業管理、可轉讓漁業權以及廢棄漁獲禁令¹⁹，旨在提供歐盟公民享有一個穩定、安全、健康的海產供應。

歐盟執委會具體主張，漁業資源應在 2015 年回復到永續捕獲量，亦即最大永續收穫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換句話說，由漁業資源的存量水準來決定每年最大的可捕量，而此存量水準可讓未來的漁業生產獲致最大成效—漁業資源存量將增加 70%，整體的捕獲量將增加 17%，而捕撈漁業的附加價值更將增加 90%。新的共同漁業的主要管理方式如下：²⁰

1. 生態系管理：廢除以單一魚種為主的舊式管理，改以多魚種、逐年監控的生態系統管理與預警原則，來大幅降低漁業活動對海洋環境的衝擊。
2. 禁止棄魚：制訂時間表逐漸減少棄魚行為，漁民須將所有漁獲帶上岸，會員國則應提供完整的漁獲量數據，以確保漁業資源評估的正確性。
3. 建立漁獲配額轉讓制度：每個會員國有一定的漁獲配額，漁業經營者可在國內進行配額交易或出租，此配額擁有期間最少是 15 年，可使無效率或想退出漁業的從業者釋出其漁獲配額。
4. 支持小規模漁業：在沿海漁業社區中，小規模漁業具有社會及文化認同的意義，其船隻數佔歐盟總船隻數的 77%，不僅不納入漁獲配額轉讓制度，且還將提供財務協助其發展。
5. 養殖漁業的永續發展：由會員國制訂策略目標，建構養殖漁業的良好發展環境，降低對進口魚產品的依賴，並促進沿岸及鄉村發展。
6. 增進科學知識：海洋環境資訊是提供良善治理的基礎，將建立會員國有關漁業資訊蒐集、管理與取得的規範。
7. 新的市場政策：摒棄以政府預算銷毀漁獲的作法，改以漁業組織進行漁獲調節，例如在漁獲價格低時進行收購，延後售出以穩定漁獲價格，並建立新的標章制度，協助漁業的永續發展。

¹⁹ European Commission, “Fisheries Reform Package”, <https://ec.europa.eu/fisheries/reform/proposals> (last visited 2019.08.11).

²⁰ 洪志銘，〈綠色經濟中的藍色部門—歐盟共同漁業政策〉，經濟部推動綠色貿易專案辦公室，2015.5.28，<https://www.greentrade.org.tw/zh-hant/knowledge/綠色貿易研究院/綠色經濟中的藍色部門—歐盟共同漁業政策>。

8. 承擔國際責任：在區域或國際漁業組織，歐盟致力漁業永續發展和對海洋生態的保育，包括與國際社會成員建立夥伴關係，共同對抗非法漁業活動。在對外的雙邊協議上，歐盟將以永續漁業協定（Sustainable Fisheries Agreements）取代漁業夥伴協定（Fisheries Partnership Agreements），根據合理的科學數據，對夥伴國無法或無意願捕獲的剩餘漁業資源進行捕撈和補償。

此外，為了能在 2014 年至 2020 年達成漁業政策成長、就業以及永續發展的目標，歐盟新設「歐洲海洋漁業基金」（European Maritime and Fisheries Fund），其具體用途有以下四點：²¹

1. 智慧及綠色漁業：協助業界朝選擇性漁具漁法、零棄魚、對海洋環境傷害較小的永續漁業方向發展，以創新及價值創造讓漁業經濟更為繁榮、更具競爭力。
2. 智慧及綠色養殖：使養殖漁業更加永續與具競爭力，也使歐盟的消費者具有更健康與營養的水產品。
3. 永續與包容的區域發展政策：增加沿岸漁業相關活動的價值，並分散對漁業過度依賴的沿岸經濟型態，以扭轉漁業社區居民的經濟困境。
4. 以整合性漁業政策進行跨區域、跨領域的協調合作來促進成長：包括傳遞海洋知識、海洋的區域規劃、整合性海岸管理與海洋監測、海岸居民的氣候變遷調適等。

此基金與原有的歐洲漁業基金（European Fisheries Fund）有幾個主要不同：以前的經驗顯示，收購老舊漁船只會讓性能更好的船隻取而代之，反而強化船隊的規模與捕撈效能，故今後不再支持漁船收購；其次，必須確實結合共同漁業政策改革的目標，才會獲得基金支持。最後，此基金將與其他財政工具緊密結合，以達成更廣泛的海洋政策目標，例如成長與就業。

這次改革後的共同漁業政策於 2014 年上路，新的法律規範旨在維持魚類種群、促進具競爭力的漁業經濟發展和穩定漁產品市場，意味著歐盟漁業政策的根本變化，尤其是永續經營已成為漁業中最重要的原則，並採取了嚴格的措施來重建魚類種群和現代漁業管理。最遲在 2020 年之前，應按照最大持續生產量原則管理所有商業捕撈的魚類種群，除可確保魚群的永續生產與利用，也構成經濟上可行的漁業基礎。²²

²¹ 同上註。

²² Peter Ørebech, “‘Getting It Right’: The Birth of a New EU Common Fishery Policy?— Legislative and Leg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nuling of the “Five Structural Failings””, *Arctic Review on Law and Politics*, Vol. 6, No. 2, 2015, pp. 111-131.

四、歐盟對台黃牌警告非法捕魚

近年來，台灣與歐盟之間有一個受到各界矚目的爭議，即有關非法捕魚的問題。漁業是海島型經濟的重要產業，還可帶動造船、漁具製造、水產加工以及漁貨運銷服務等相關產業之發展。除了沿岸漁業之外，我國漁船也在世界各大洋區進行捕撈作業，甚至成為遠洋漁業強權之一。遠洋漁業除了為台灣帶來豐厚收益，也因為漁業合作，打開許多國際活動空間。一般估計，台灣的漁貨出口金額約為 20 億美元，主要市場為泰國、日本和美國，每年出口至歐盟的漁業總額約 1300 萬歐元。²³由於現今漁業資源日益枯竭、競爭越趨激烈，我部分漁民所從事的非法捕撈作業，也受到國際、特別是歐盟的關注。

「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 ICCAT) 在 2005 年 11 月調查發現，台灣遠洋漁船有違法捕魚行為，而給予警告和處罰。²⁴因為政府始終缺乏有效監督和控管遠洋漁船的監管機制，對於我方與非洲的葛摩聯邦 (Union des Comores) 進行的非法捕魚，歐盟執委會認定乃未遵守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 義務，而在 2015 年 10 月將台灣列入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業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 Fishing)」不合作第三國的警告名單 (黃牌名單)，要求我 6 個月內改善，否則將改列為紅牌的不合作國家，並祭出漁業貿易的制裁措施。²⁵就在半年限期將屆之際，行政院趕緊將「遠洋漁業條例草案」、「漁業法」及「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進立法院審查，而歐盟執委會海洋事務及漁業總署還派遣觀察員來台「緊盯修法」。²⁶

²³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臺灣製造—失控的遠洋漁業》(台北：綠色和平，2016)，頁 9；江今葉，〈台灣非法捕魚，歐盟發黃牌警告〉，《中央社》，2015.10.1。

²⁴ 由於歐盟掌管共同漁業政策，故以「政府間經濟統合組織」(Inter-government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的獨立身分取代其會員國原本之會籍，成為該漁業組織的締約方。台灣則自 1972 年起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年會與相關會議，1999 年取得「合作非締約方、實體、或捕魚實體」(Cooperating Non-Contracting Party, Entity or Fishing Entity) 地位，享有針對漁業資源養護與管理事項之提案權。大西洋為我遠洋鮪釣漁船之主要作業漁場之一，為維護漁捕權益，每年均派員出席各項會議，與該組織各締約方共同參與討論。參見：蔡天享、黃鴻燕，〈大西洋鮪漁業國際管理之發展趨勢〉，《農政與農情》，第 115 期，2002，頁 71-75；ICCAT Secretariat, “Contracting Parties”, 2014.12.18, <https://www.iccat.int/en/contracting.htm>.

²⁵ World Fishing, “Yellow cards for Taiwan and Comoros”, Hampshire (UK), 2015.10.1, <http://www.worldfishing.net/news101/industry-news/yellow-cards-for-taiwan-and-comoros>.

²⁶ 彭宣雅，〈我非法漁業黃牌，歐盟來台盯修法〉，《聯合晚報》，2016.6.1；漁業署新聞稿，〈積極作為希望儘速解除歐盟黃牌名單〉，2016.3.16, <https://www.fa.gov.tw>。

自 2015 年以來，我國與歐盟在「法律架構」、「監控、控制及偵查」、「水產品可追溯性」及「國際合作」等四個面向，歷經長達 3 年 9 個月的諮商，終於在今年 6 月 27 日獲執委會同意，將台灣從歐盟打擊 IUU 漁業黃牌名單上移除，雙方並同意成立打擊 IUU 漁業工作小組，持續深化合作，以確保合法捕撈漁獲並具可追溯性。²⁷除此之外，我國也須積極參與國際漁業管理組織，遵守國際規範，善盡國際責任，確保海洋漁業生態健全，永續漁業經營。然而，即便遠洋漁業三法已完成立法和修法程序，歐盟也解除黃牌警告，我政府和漁政單位是否有決心、配備足夠資源和人力落實執法，仍是未來台灣要持續努力的方向。

五、結語

自 1983 年制定共同漁業政策後，歐盟便經由會員國的共同管理與規範，使得歐盟整體漁業能朝永續發展的方向邁進，透過制訂捕魚規範、提供會員國執行政策的工具、監督歐盟船隊規模、協助生產者、加工業者與經銷商獲得公平的銷售價格以及為消費者確保魚產品的品質、協助發展養殖漁業、提供科學研究的財務協助、以及代表會員國與國際或區域漁業組織協商合作。隨後共同漁業政策幾經翻修，2014 年改革後新的法律規範旨在維持魚類種群、發展具競爭力的漁業經濟和穩定漁產市場，標示著歐盟漁業政策的根本變化，尤其是永續經營已成為漁業中最重要原則，並採嚴管措施來重建魚類種群和現代漁業之管理。

台灣近海資源幾近枯竭，沿海漁業社區的發展仍待持續更新，而政府卻仍有不少的漁業補貼措施，包括漁船用油補貼或是老舊漁船收購等，歐盟最近一次的改革則拋棄這類以官方預算直接補貼與收購的作法，新創的基金也不再支持有害漁業資源存量的活動，而是有計畫地運用在海洋資源保護、漁業社區轉型與漁獲配額交易制度的建立。縱使台灣尚無法在短期內就與歐盟齊步，但維繫漁業資源與漁民生計和漁業社區發展是息息相關的，漁業部門的永續發展終究是四面環海的台灣必須堅持的正確方向。

²⁷ 漁業署新聞稿，〈臺灣自歐盟打擊 IUU 漁業黃牌名單除名〉，2019.6.27，<https://www.fa.gov.tw>。

參考文獻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369/2002 of 20 December 2002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2792/1999 laying down the detailed rules and arrangements regarding Community structural assistance in the fisheries sector”, *OJ L* 358/49-56, 31.12.2002.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371/2002 of 20 December 2002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fisheries resources under the Common Fisheries Policy”, *OJ L* 358/59-80, 31.12.200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170/83 of 25 January 1983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system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ishery resources.” *OJ L* 24/1-13, 27.1.1983.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171/83 of 25 January 1983 laying down certain technical measur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OJ L* 24/14-29, 27.1.1983.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57/82 of 29 June 1982 establishing certain control measures for fishing activities by vessels of the Member States”, *OJ L* 220/1-5, 29.7.198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908/83 of 4 October 1983 on a common measure for restructuring, modernizing and developing the fishing industry and for developing aquaculture”, *OJ L* 290/1-8, 22.10.1983.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3760/92 of 20 December 1992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system for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OJ L* 389/1-14, 31.12.1992.

“Regulation (EEC) No 2141/70 of the Council of 20 October 1970 laying down a common structural policy for the fishing industry”, *OJ L* 236/1-4, 27.10.1970.

“Regulation (EEC) No 2142/70 of the Council of 20 October 1970 on the common organisation of the market in fishery products”, *OJ L* 236/5-20, 27.10.1970.

Archer, Clive, *The European Union: Structure and Process*. London: Continuum, 2000.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Common Fisheries Policy - A User's Guide*.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9.

ICCAT Secretariat, “Contracting Parties”, 2014.12.18, <https://www.iccat.int/en/contracting.htm>.

Jensen, Carsten L.,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Common Fisheries Policy*. Esbjerg: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Business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1999.

Lippert, Christian, “Fischereipolitik”, in Werner Weidenfeld and Wolfgang Wessels (eds.), *Europa von A bis Z*, 13th ed. Baden-Baden: Nomos, 2014, pp. 266-269.

McCormick, John, *Th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and Policies*, 3r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4.

Ørebech, Peter, ““Getting It Right”: The Birth of a New EU Common Fishery Policy? — Legislative and Leg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nuling of the “Five Structural Failings””, *Arctic Review on Law and Politics*, Vol. 6, No. 2, 2015, pp. 111-131.

World Fishing and Aquaculture, “Yellow cards for Taiwan and Comoros”, 2015.10.1, <http://www.worldfishing.net/news101/industry-news/yellow-cards-for-taiwan-and-comoros>.

江今葉，〈台灣非法捕魚，歐盟發黃牌警告〉，《中央社》，2015.10.1，<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10015017.aspx>。

林語崇，《歐洲聯盟共同漁業政策之發展與變革》。嘉義：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洪志銘，〈綠色經濟中的藍色部門－歐盟共同漁業政策〉，經濟部推動綠色貿易專案辦公室，2015.5.28，<https://www.greentrade.org.tw/zh-hant/knowledge/綠色貿易研究院/綠色經濟中的藍色部門－歐盟共同漁業政策>。

張平怡，《歐洲共同體共同漁業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彭宣雅，〈我非法漁業黃牌，歐盟來台盯修法〉，《聯合晚報》，2016.6.1。

鄒忠科，〈歐盟共同漁業政策研究：兼論其對台灣漁業政策之啟示〉，《歐洲國際評論》，第8期，2012，頁1-37。

漁業署新聞稿，〈臺灣自歐盟打擊 IUU 漁業黃牌名單除名〉，2019.6.27，<https://www.fa.gov.tw>。

漁業署新聞稿，〈積極作為希望儘速解除歐盟黃牌名單〉，2016.3.16，<https://www.fa.gov.tw>。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臺灣製造—失控的遠洋漁業》。台北：綠色和平，2016。

蔡天享、黃鴻燕，〈大西洋鮭漁業國際管理之發展趨勢〉，《農政與農情》，第115期，2002，頁71-75。